



快 訊

SSL Express

2015 年第 51 期 (总第 147 期 , 12 月 3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近日,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环球时报》撰文,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该文刊登在《环球时报》2015年11月3日第14版,这里全文刊发:

“全面二孩”将成经济社会双重杠杆

文/郑秉文

“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近日成为舆论热议焦点。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目的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和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从本质上讲,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所针对的是日益严峻的“少子化”趋势及其导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国遭遇少子化和老龄化双重压力

少子化与老龄化指的都是人口结构的逆向变化,二者相连但不完全是一回事。在不考虑移民因素的静态条件下,导致老龄化的因素大致有两个,一是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条件改善等,人口寿命预期延长,这就是所谓的“长寿风险”;二是在人口寿命预期既定的情况下,少子化也可能将导致人口结构发生逆转,老龄人口占比大大提高,甚至超过警戒线,威胁到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等。

目前,国际上对少子化的量化标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但从研究角度看,笔者认为少子化至少应指“总和生育率”(TFR,指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的数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水平(即低于“2.1”)。如果将其转化为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

18%左右。此外，笔者认为，也可用“少儿赡养率”这个概念来描述和衡量少子化程度，即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一般来说，如果将总和生育率“2.1”转换为少儿赡养率，25%可视为少子化的一个标志。

中国的寿命预期延长和少子化这两个方面都十分异常。中国人均寿命提高十分迅速，新中国刚建立时人均寿命只有43.4岁，到2015年联合国预测为75岁。相比之下，201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仅为78.3岁，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少子化现象更加严峻：2010年中国刚刚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为4200美元以下），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下降到1.53，而当年全球“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总和生育率则是3.08，中国低了整整一倍。与“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4200-13500美元）平均总和生育率1.82和“高收入”国家的1.76相比，中国的数据也偏低。同样，中国少儿赡养率2010年为23.4%，也低于所有三组经济体（“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平均水平。纵向上看，新中国建立以来，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1965年是生育高峰，总和生育率达6.30，此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倡便逐年下降，到2000年下降到谷底1.48。此后略有反弹，到2015年是1.55。少儿赡养率的下降曲线与总和生育率十分吻合。在50年时间里，少子化现象就变得如此严峻，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少子化高峰还未到来。

西方发达国家靠移民政策缓解少子化压力

长寿风险基本都发生在高收入国家，同时，少子化也都发生在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数据显示（引自联合国，下同），就总和生育率来看，世界平均水平是2.51，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只有1.75。比较起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则高达5.10，南亚是2.56，拉美是2.15。而“少儿赡养率”世界平均水平是39.7%，高收入国家是26.0%，撒哈拉以南非洲高达79.8%，南亚45.4%，拉美38.6%。

就总和生育率来说，高收入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少子化国家，但由于移民等原因，在少儿赡养率这个指标上，高收入国家略好一些（26%），其中英、法、美就更好。这或可以解释为，这些国家通过移民政策等手段缓解了由于总和生育率低下导致的少子化趋势。相较而言，在长寿风险和少子化的双重夹击下，中国人口结构急剧逆转，老龄化来势汹汹。60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比例2015年上升到15.2%。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曲线告诉人们，虽然长寿风险导致人口老龄化，但在“一胎化”计划生育的大背景下，少子化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推手之一，因此，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便自然而然地提到决策层的案头。

全面放开二孩，经济与社会作用兼具

2013 年底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开放“单独二孩”政策。当时，有关方面估计，在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 1100 万人中，第一年大约能有 200 万申请生育二胎，但结果却大大低于预测值，提出申请的仅 69 万人。在这样背景下，五中全会果断作出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这是非常及时且非常必要的，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做重大调整，少子化的趋势将难有根本改变。静态地看，少子化的积极因素将可集中和优化教育资源，缓解就业压力，特别是减少劳动就业一代的抚养压力等。但动态地看，这些积极因素很快就会转化为消极因素，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首先，少子化将影响社会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产生明显的“置换”效应。例如，对妇幼儿科医院、中小学教育的需求将会减少。这对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来说将形成使用效率问题。相应地，医疗卫生和教育的就业机会也将受到较大影响。少子化的预期必然是老龄化，大量“腾退”的校舍医院等社会基础设施，将更多地被养老院所“占用”。其次，对产业结构也将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乳制品业、食品加工业、玩具和电子游戏产业、房地产等，他们将不得不调整消费群体对象，或转产或限产，或产业升级等。最后，少子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在少子化趋势下，劳动就业人口占比将逐渐下降，进而，人口规模将呈绝对下降趋势，在土地、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不变的条件下，劳动供给减少必将减少劳动产出，经济增长必将受到影响。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全面放开二孩，在进入新常态之后，是撬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双重杠杆。可以肯定的是，在短期内，二孩婴儿潮蕴含的消费潜力将逐年释放，并将形成稳定的上升曲线，对相关的食品玩具、婴儿服饰、妇婴保健、教育行业等起到拉动作用；中期看，房地产需求将有所刺激，水泥、钢铁等相关产业也将受益，经济增长潜力得以发掘，增长预期将出现利好；长期看，二孩婴儿潮无疑会对楼市等资产价格产生一定影响，对老龄化趋势下楼市价格下滑趋势具有一定的对冲作用，进而对其他资产价格也都产生积极影响。▲（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原文链接： 环球网
www.huanqiu.com

中国首架C919大型客机2日在上海中国商飞正式下线，这是中国自主研发

对C919即使不鼓掌，也莫喝倒彩

一重大成就，这是中国人应当有的出息。这架飞机下线

大飞机的里程碑，也是中国高端制造业的突破性进展。C919大型客机可布置158座至174座，最大航程5555公里，是按照全新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干线民用客机。自制这样的大飞机是中国长期的梦想，也是中国制造业的一块“硬骨头”，因此首架C919型客机下线非常可喜可贺。

C919明年才能首飞，并须经一系列飞行测试，最早2018年投入使用。但首架下线的大幕已经拉开，目前型号飞机已订出517架，其中德国等外国航空公司订购了17架。C919将是中国参与国际干线客机整机市场竞争的开始。

一架大型客机有100多万零部件，此前有媒体报道称C919机上一半以上零部件源自外国公司，它们包括发动机、航电、飞控及起落架等关键设备。第一架国产大型客机虽然下线了，虽然大型客机制造业都是全球采购零部件，但C919还是清楚地展现出我国航空业这种客机

生产巨头的差距。中国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每年会拿出一部分收入用来购买出行的机票，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航空市场，这一市场还在急剧扩大。可以预期，未来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每年都会把不少钱交给航空公司，航空业占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比例在今后很多年里都将上升。如果中国自己造不了大飞机，我国的现代化就进不了快车道。

直到今天国人都认为当年造10辆下马奔马造辆，首架C919的下线标志着中国重新造出世界航空制造业的产能已经全面启动。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多大的差距都不怕，只要认真干，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什么都能做点。我们的造机速度有可能大大快于我们这第一步之前的估计。中国飞机制造业正雄心勃勃，经济

学家们也大多看好我国发展大飞机的前景。但是一些现实的声音从互联网上传出，它们一是不相信中国有造出类似飞机制造巨头的能力，二是觉得C919这样的飞机即使造出来也没人敢坐，还是让领导们先去坐吧。

飞机安全是所有交通工具中最让人揪心的安全，它一挂一毫就得不得，一些人对国产大飞机缺少信任感，这应当说可以理解。他们在互联网上发布牢骚，说些风凉话，没啥不正常的。

但网上风凉话的发酵似乎太快了，总体还是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全世界哪国大飞机都第一位，没有人会为爱国企业有安全隐患的飞机。但中国自己的大飞机下线，即使想到第一次坐它会存在不踏实，也应该先为它点个赞，祝贺中国工业的这

一重大成就，这是中国人应当有的出息。这架飞机下线，有人将其那些飞机的研制者、生产者、购买者、运营者，还有更多人会是它们的受益者。剩下了人，请多说几句鼓励的话，做些严肃的提醒和监督，但请尽量少喝几声倒彩，行不行？

为国产C919下线鼓掌喝彩，祝愿它的试飞和各种测试顺利，飞机的性能能受得住洗礼，也祝愿中国的宽体客机研制能够逐步成熟。那将是中国工业的骄傲和多少倍数的科技实力提升，可以夸夸地说，能够自主生产大型客机，包括这架宽体客机的中国将是与今天相当的“另一个中国”。

会有很多中国人直接参与迎接那个中国的到来。有人将是那些飞机的研制者、生产者、购买者、运营者，还有更多人会是它们的受益者。剩下了人，请多说几句鼓励的话，做些严肃的提醒和监督，但请尽量少喝几声倒彩，行不行？



“全面二胎”将成经济社会双重杠杆

郑秉文

“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近日成为舆论热议焦点。这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目的是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从长远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所针对的是日益严峻的“少子化”趋势及其导致的老龄化问题。

中国遭遇少子化和老龄化双重压力

少子化与老龄化都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二者相伴随不完全是一回事。在不考虑移民等因素的条件下，导致老龄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和医疗条件改善，人口寿命预期延长，这就是所谓的“长寿风险”；二是在人口寿命预期延长的情况下，少子化也可能导致人口结构发生逆转，老龄化占比比大提高，甚至超过警戒线，威胁到经济和社会安全等。

目前，国际上对少子化的量化标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但从研究角度看，笔者认为少子化至少应指“总和生育率”(TFR，指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的数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水平(即低于“2.1”)。如果将其转化为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为18%左右。此外，笔者认为，也可用“少子化率”这个概念来描述和衡量少子化程度，即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一般来说，如果将总和生育率“2.1”转换为少子化率，25%可视为少子化的一个标志。

中国的寿命预期延长和少子化这两个方面都十分异常。中国人均寿命提高十分迅速，新中国刚建立时人均寿命只有43.4岁，到2015年联合国预测为75岁。相比之下，2015年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仅为73.3岁。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另一方面，中国少子化现象更加严峻。2010年中国刚刚走出“下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DP为4200美元以下)，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下降到1.53，而近年全球“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总和生育率则是3.08，中国低了整整一倍。与“上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

为4200-13500美元)平均总和生育率1.82和“高收入”国家的1.76相比，中国的差距也很低。同样，中国少儿抚养率2010年为23.4%，也低于所有三组经济体(“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平均水平。

纵向上看，新中国建立以来，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1965年是生育高峰，总和生育率达6.30，此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倡便逐年下降，到2000年下降到谷底1.48，此后略有反弹，到2015年是1.53。少儿抚养率的下降曲线与总和生育率十分吻合。在50年时间里，少子化现象就发生如此严峻，这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少子化高峰还未到来。

西方发达国家靠移民政策缓解少子化压力

长寿风险基本都发生在高收入国家，同时，少子化也发生在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数据显示(引自联合国，下同)，就总和生育率来看，世界平均水平是2.51，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只有1.75，比较起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则高达5.10，南亚是2.56，拉美是2.15。而“少子化率”世界平均水平是39.7%，高收入国家是26.0%，撒哈拉以南非洲高达79.8%，南亚45.4%，拉美38.6%。

就总和生育率来说，高收入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属于少子化国家，但由移民等原因，在少子化率这个指标上，高收入国家好一些(26%)，其中英、法、美就更好。这可以解释为，这些国家通过移民政策等手段缓解了由于总和生育率下降导致的少子化趋势。

相较而言，在长寿风险和少子化的双重夹击下，中国人口结构急剧逆转，老龄化来势汹汹。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到2015年上升到15.2%。人口老龄化发展最迅猛的曲线告诉我们，虽然长寿风险导致人口老龄化，但在“一胎化”计划生育的背景下，少子化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推手之一。因此，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便自然而然地提到决策层的案头。

全面放开二胎，经济与社作用兼具

2013年底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

开放“单独二胎”政策。当时，有关方面估计，在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1100万人中，第一年大约能有200万中国孩子降生，但结果却大大低于预期值，提出申请的仅60万人。在这样背景下，五中全会果断作出全面放开二孩的决定，这是非常及时且非常必要的，对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做重大调整，少子化的趋势将难有根本改变。特别地看，少子化的加剧因素将集中到优化教育资源，缓解就业压力，特别是减少劳动就业一代的抚养压力等。但动态地看，这些加剧因素很快就会被转化为消极因素，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首先，少子化将影响社会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产生明显的“规模”效应。例如，对妇幼保健院、中小学校的需求将会减少。这对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来说，使用效率问题。相应地，医疗和教育领域的就业机会也将受到较大影响。少子化的预期必然是老龄化，大量“闲置”的社会基础设施，将更多地被养老院所“占用”。

其次，对产业结构也将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乳制品业、食品加工业、玩具和电子游戏产业、房地产业等，他们将不得不调整消费群体对象，或转产或减产，或产业升级等。

最后，少子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在少子化趋势下，劳动就业人口占比将逐渐下降，进而，人口规模将呈现下降趋势，在土地、资本、技术等其他要素不变的条件下，劳动供给减少必将减少劳动产出，经济增长必将受到影响。

因此，在这个关键时期，全面放开二孩，在进入新常态之后，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双重杠杆。可以肯定的是，在短期内，二孩婴儿潮带来的消费潜力将逐年释放，并将形成稳定的上升趋势，对相关的食品玩具、婴儿服饰、母婴保健、教育等行业起到拉动作用；中期看，房地产需求将有所刺激，水泥、钢铁等相关产业也将受益，经济增长潜力得以提振，增长预期将得到利好；长期看，二孩婴儿潮会联合对楼市等资产价格产生一定影响，对老龄化趋势下楼市价格下降趋势具有一定的对冲作用，进而对其资产价格也都产生积极影响。▲(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11月2日，土耳其第26届国民议会选举的结果基本揭晓。这是土耳其历史上最受关注的选举之一，结果大大出乎观察家的预料，5个月后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最终获得超过半数席位，赢得单独组阁权。土耳其也终于结束了长达5个月的政府悬置状态，或可迎来一段时期的政局稳定。尤其对于土耳其的经济、外交和反恐而言，一个稳定的政府是现阶段人们非常渴望的。

在此之前，就土耳其政局的预测性分析——包括笔者，都认为此次选举结果与今年6月7日的选举不会有大的差别。但从土耳其的官方统计数字来看，正发党的实际得票率是49.47%，在议会550个席位中拿到了317席，相比6月份的258席，增幅不小。正发党为何能获得如此令人意外的胜利呢？这次进入议会的还是在6月份的那个政党，不同的是，两个民族主义政党——右翼的民族主义行动

地区反恐需要稳定的土耳其

党(希普鲁德人的人民民主党——得票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勉强过了议会的10%这个门槛。从这些简单的数字变化可以看出，民族主义者的选票普遍流向了正发党。应该说，此前正发党领导的临时政府打击在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工人武装力量行动，可能赢得了不少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库尔德人问题在中东是一个“微妙而敏感”问题。以希普鲁德人的人民民主党(希普鲁德工人党)为例，两者之间在战略上的分歧日益明显，前者主张和平，后者主张武装斗争。目前，库尔德工人党的武装力量日益增强，政府对它的打击也日趋激烈。

从正发党政府的角度来说，打击库尔德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当然能够赢得民族主义者的好感，获得民族主义行动支持者的选票，削弱人民民主党的力量。这次选举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过去5个月受到中东地区大环境和国内因素的影响，土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都非常不稳定——经济的停滞、叙利亚的难民问题、俄罗斯黑客等干预叙利亚、安卡拉的恐怖袭击等等，都使得人们对土耳其的未来非常担忧，对一个稳定政府的高望是社会普遍共识。

正发党作为中东地区倾向于现代主义的伊斯兰保守势力的代表，它在土耳其宪政权力，对于它的支持的埃及、叙利亚以及其它北非国家的伊斯兰主义势力都是个重要的鼓舞。正发党执政的土耳其政府仍会持续支持这些势力的支持。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主义模式并未失去其吸引力。

从地区形势来说，一个稳定的土耳其的出现，对中东地区将带来积极的影响。正发党政府将致力于解决经济增长、难民和恐怖主义问题。但是，这些条件都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根本性的难题，正发党政府短期内也不可能拿出经济良方，它的战略与实践需要结合并适应地区形势、国际环境、大国战略、油气等复杂因素。▲(作者系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

声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简称“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英文为 The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urvey and Data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ICSD CASS, 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和领导的规模化、规范化调查、研究和咨询机构，是面向国内外各类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的综合性信息发布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CISS CASS, 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学术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成为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 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究资源和人才队伍，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和“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联合发起设立，受“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直接领导，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工作论文》四项产品，2013 年 11 月开始发布《银华讲座》。其中，《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银华讲座》四项产品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工作论文》和《银华讲座》，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北京 1104 信箱（邮编：100007）

电话：(010) 64034232 传真：(010) 64014011

网址：www.cisscass.org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